

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

西方文论

XIFANG WENLUN

与中国

YU ZHONGGUO

文学

WENXUE

马发祥 著



10-03/17

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

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

周发祥 著



RB 184/04



主 编 傅璇琮
周发祥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
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

周发祥 著

责任编辑 任 晖

出 版: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
(南京马家街31号,邮政编码:210009)

照 排:南京理工大学激光照排公司

发 行: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

印 刷:丹 阳 兴 华 印 刷 厂
(丹阳市胡桥镇 邮政编码:212313)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5.375 插页 5 字数 363 800

1997年11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1—4000册

ISBN 7—5343—2891—8

G·2613

定价:20.80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傅璇琮 周发祥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世界各国瞩目中华文明时,无不对中国古典文学投以青睐。因为这份丰厚的遗产,不仅荷载着中华文明的精华,而且它自身尤有一种卓尔不群的美质。它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已经形成了一种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现象,为世界文学关系史增添了光辉壮丽的一页。而在中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日益深入的当今时代,建立开放型的文学研究也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我们作为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者,理应适应时代的需要,认真把握中国古典文学的这段外播历史,发掘其内涵,总结其规律,使之在推动文学研究

现代化的壮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我们面向 21 世纪的今天,回顾一下本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当会产生一种学术上的迫切感,那就是这种研究不能总是囿限在传统的文献范围做文章,新一代学人应当把视野扩展到全世界,应当从历史角度回溯中国古典文学由近而远地走向世界的轨迹,而且应当站在当代学术的高度,来审视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触及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特异的文化现象。近几百年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东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固有精神和价值的探索,实际上可以说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互相认识和补充。这也构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丰富繁复的图象。尤其是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它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被世界所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日益深化,这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课题。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了解这一切,更是开拓学术领域,提高学术境界,使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协调、相接轨的必要途径。

虽说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必然趋势,但像中国古典文学这样外播如此广泛而持久、影响如此巨大而深远者,实在并不多见。也许只有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庶几可比,——不过,照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思的话说:“希腊衰微了,罗马倾覆了,中国却跟我们同在,而且它的文学作品,直到今天依然如潮水般地涌现着……。”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历程,不难看出,实际存在着近播邻国和远播欧美两大潮流。它的流播所至,影响所及,也正是所谓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个领域。

中国文学的外播,同任何民族文学的外播一样,始自与近邻的文化交流。韩国史书有箕子入朝、诗书从焉的记载(《东国通鉴》),这就是说,早在殷周之交,它就借助车马舟楫之便,传

入了山水毗连的邻邦。此后它又东渡扶桑,南至菲、越、緬、泰诸国,对于远东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文学在邻国的播扬之中,以东渐日本最为引人注目。公元3世纪(应神天皇十五年),儒家经籍由百济传入了日本,这是它东播的肇始(见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记》)。那时,日本还没有本国的文字,从外舶来的中国文学便成了唯一的书面文学,也成了以汉字为书写媒介的“汉文学”的催生剂。关于这种情况,日本学者有所描述:“用这一帝国的共通语——汉语,来表现人类世界所共通的思想与感情,是日本知识阶层理所当然的使命。”(中村真一郎《江户汉诗》)日本文学不仅借用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代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随着文学思潮的兴替,汉文学作家追随中国文苑新说,步武文坛巨子者,代不乏人。甚至侍宴应制、聚饮唱和、登临抒怀、伤时感事等文人习尚,也以中国为摹本。在假名出现以后,日本的和文学应运而生,不过,这种本土文学依然与中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由于假名的普及,中国文学通过训读本、训译本和意译本而拥有了更为广大的读者。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学纷至沓来,中国文学的地位相对而言有所下降,但它的传播,却借助现代学术而有了新的广度和深度。总而言之,它对日本和其他邻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实属罕见。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即使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未能像汉语对远东的影响那样,占据支配的、正统的地位。”(孔雅瑟《亚洲文学》)

中国与欧美相距迢遥,其间且有关山阻隔,中国文学的西播自然起步较晚。一方面,我国汉代曾经开拓西域,发使“黎轩”(《史记·大宛传》),但并没有把文学带到欧洲去。另一方面,虽然早在公元前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就已经提及中国,后

来柏朗嘉宾、马可·波罗等人的报导也给西方人民以多种遐想,但直到16世纪西班牙学者门多萨撰写《大中华帝国史》之时,西方史籍才稍稍涉及中国的语言和文学。1590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完成了明代童蒙读物《明心宝鉴》的西译,迄今所知,这是中国文学正式西播的肇端。自明末清初以降,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得以亲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出于传播宗教的目的,大量翻译儒经和其他经典,客观上却为中国文学的西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通过这些传教士,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现了许多趣闻和佳话,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移植中国戏剧,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称赞中国小说,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翻译《诗经》,均直接间接地与传教士的译介活动有所关联。进入本世纪以后,全球性的人文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传统信念的震撼,中国作为独立之邦的复兴,西方现代派对异国艺术的孜孜追求,比较文学平行学派的隆然崛起等等——这一切,均给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西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运,使它继而影响到了西方的现代文学,诸如意象派、垮掉派。赛珍珠、布莱希特以及其他作家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结缘,便是它在西播历程中的新篇章。异质文学姿态别具,彼此间易于取长补短,有着极强的互补性。鉴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影响一定会更加广泛,更加深入。

中国古代典籍在世界各地的流传,几乎无不是通过学者的译介、注释和研究而完成的,所以它外播伊始就与传入国的学术息息相关。经过长期的积累,在国外首先形成了综合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Sinology);后来渐渐分化,甚至文史、语文的综合研究也渐渐解体;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终于脱颖而出,并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和学派传统。从横向来看,如今日

韩、俄苏和欧美的学术,堪称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三大板块。尽管这些学术实体有历史久暂之分,成果多寡之别,但它们无不是既重视译介,又重视研究。两者双管齐下,互相促进,使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一步步走向深入。但中国古典文学内容丰富,卷帙浩繁,学者们又不得不力求更加精细地分工,去专攻某代文学,某类文学,甚至某个作者。在各个研究领域,从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从文人作品到民间文学,国外汉学界几乎均有一批各擅胜场的专门家,均撰有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这是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进行的研究,与国内研究相比,明显具有若干特色。第一,这一研究在将中国文学与本国文学互相比照、证同辨异之时,便自然而然具备了比较文学的性质。跨越国界追寻中外文学间的实际联系,辨认中外文学间的似与不似,是比较研究关注的焦点。平行学派倡导东西方文学的比较,更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第二,这一研究是新的研究方法的试验田。本世纪西方此起彼伏的文艺思潮,冲击着各国的学术论坛,中国文学研究亦受其影响。诸如意象派、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创作主张和批评理论,都曾经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另一方面,跨学科的横向研究(即移植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理论,用于文学研究)也以中国文学为对象积极开展起来。凡此种种,无不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国外学者的批评方法、分析角度相对来说较为灵活多变,其文艺观、价值观以及趣味好尚又与我们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这一研究所做的结论,很多在国内论坛实属罕见。第四,这一研究经常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例如,瓦西里耶夫(俄)、翟理思(英)等人所撰的中国文学史,均早于国人的同类著作,是一种开风气之先的研究。又如国外佚书的

著录和考证,国内学者往往不得其便,这是一种占尽地利的研究。再如游仙诗、寒山诗研究,则又常常以不同于国内的文化心态进行观照。第五,这一研究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国外绝少关门闭户做学问的现象,学者们很注意参考其他国家(包括我国)的研究成果,在着手做某一课题之前,务求资料详备而后止。他们重视从国际学术的背景上考虑问题,目的是为了 avoid 资料的疏漏、观点的偏颇或者劳动的重复。

除了上述共同的特点之外,各个学术板块相互比较,也可见出不同的特点。日韩的治学方法受我国传统的影响很深,他们在吸收西方学术的同时,仍以传统眼光大量做注释、考证、校勘、索引等学问,并且做得又深又细。西方学者有不少得益于日本学术。苏联和东欧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特别重视进步文学的研究,多从社会和历史角度去考察作品的人民性、阶级性或思想性。美澳西欧诸国(尤其是美国)的学者,喜欢尝试新方法,每每从作品的形式入手,进而剖析作品的技巧和意蕴。他们明显有追随新文艺思潮和学术思想的倾向。总之,国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由于采取了移植新观念、试验新方法、开辟新领域、交流新成果等做法,使自己的学术品格具备了现代性与国际性。

既然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是一种历时悠久、横贯东西、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现象,那么,我们如何着手进行考察,才能窥见其全貌,捕捉其精髓,从而获得有益的借鉴呢?

我们认为,要想全面而又系统地把握这一文化现象,应该采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两种方法。所谓历时研究,就是从纵向角度去梳理中国古典文学向外传播的历史。如上所述,它在同质文化圈和异质文化圈里的传播情况,是互不相同、各有特色的。不同对象应该不同对待,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但无

论遇到的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应该采用渊源学、媒介学和流传学的视角,分别描绘出外播的热点与重心、触媒与契机、途径与方式、际遇与影响。民族文学向国外传播的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件,而是我们对于与之相关的客观存在的理性认识。因此,任何一种有关文学外播历史的描述,都必然与文化观、历史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体察世界文化与文学如百川汇海、既见融合又见分立的总体趋势,才能明辨异国他邦对中国文学何以采取亲疏、迎拒态度的深刻原因,才能透过文学与文化交流那种错综复杂、千姿百态的表面现象,去把握其潜在的客观规律。

所谓共时研究,就是从横向角度去清理国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丰硕成果。由于国外学者的主客观条件与我们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必然会对某些作家作品、某些文学问题持有不同的见解。他们也常常采用中国古今学者的定论成说,但即使如此,即使论述的是同一个问题,在那种特殊的学术环境里,也不乏其独有的真知灼见、弘论博识以及可备一说的论断。显而易见,如果单纯地依靠纵向梳理中国文学外播史的方法,便不可能完善地总结这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设立专题,分门别类,横向加以归纳、整理,是一个切实可行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如果一味地述而不作,引而不论,当然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应该说针对那些纷纭、新奇的论点,辨明它们是正确还是错误,全面还是片面,公允还是偏颇,积极还是消极,也是十分必要的。由此看来,这项工作实际上还具有披沙拣金、采珠集玉的性质。

基于上述设想,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相应地分成了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两个系列。前者是关于中国

古典文学外播历史的梳理,按照学术板块分别加以描述。但为了说明某一影响的性质,也不排斥通过横向比较进行阐说。后者主要是以文学体裁为单位,整理、归纳比较重要的学术观点,与此同时,也用一定篇幅来概括说明某一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纵一横、纵横交织的探索,最终能够对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这一文化现象,做出系统深入、全面细致的描述。

这是一项特殊的信息反馈工作,我们坚信,它能够带来多方面的报偿。首先,它扩大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我们在此可以看到普遍流行的“若无中国文学这块瑰宝,便不得世界文学全璧”的共识,可以看到国外学者矢志破除“东归东、西归西”这一顽固观念的伟业,也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各国文学衬托之中的鲜明形象。这些信息不仅启迪着我们长久弘扬中华文明的思想,而且为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质和地位,提供客观公正、准确无误的参照和标准。其次,它可以带我们进入国外学术研究的氛围,使我们得以窥见形形色色的研究方法,以及林林总总的具体观点。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消说,这些他山之石如能及时引进,一定会有利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实际进展。因为在此揭示的新方法、新视角和新观点,正如中国文学之补益于外国文学,无疑可以开启我们的思路,成为我们积久成习的思维模式的重要补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把切磋研讨国际化,自然可得兼听的好处。所以,对我们而言,学术交流更是文学交流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再次,它可为文学创作提供参考。当代文学创作不可能孤立而存,总要受源远流长、势能强大的传统的制约与激发。而对于传统,我们又习惯于采取因循的态度,有时竟至于“不识

庐山真面目”。国外的研究,因为换了透视的角度,对传统多有新见。例如,在《诗经》里寻找意识流手法,在梦窗词里分辨现代派的跳跃式思维,或者否认所谓传统小说心理描写不足的说法,而认为它以言谈举止写心理,更写得心机毕露,情志昭然……。这些探索和观点,若能达于当代作家的视听,想必会改变对古典文学的传统看法,或许会促使他们从中汲取创作的营养。最后,它还可以反馈多种有关的学术信息,如海外佚书、汉学机构、学者生平、学术会议、研究计划等等。这些情况或是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是它附属性的种种侧面,若对此有所了解,显然有利于进一步开展中外学术交流。

无须讳言,这一课题也具有一定的难度。由它本身固有的性质所决定,研究者需要涉及较为广泛的学术领域。这就是说不仅要熟悉国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还要了解国内有关的学术背景;不仅要把握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史,还要了解国外历代渗入汉学领域里的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此外,在这一学术领域虽然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仍有许多空白急待填补,仍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问题,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再加上这一课题的原始资料大多数在国外保存,可想而知,搜集起来又是何等的艰难!因此我们结成写作小组,一方面互相切磋,集思广益,并且广泛征求专家的宝贵意见,以补偿我们知识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想方设法搜集文书,以弥补原始资料的匮乏。所以,我们的撰写过程,一直是个不断克服种种难题的过程。

最后还有几个技术性问题须加以说明。第一,为便于介绍,我们把国外汉学分作“东方”、“西方”和“俄苏”三大板块,这些名称并不完全等同于地理上的概念;第二,台港学术具有

国际性,在此发表的西文著述,可视为西方学术的组成部分,因此本丛书采而用之;第三,本丛书所涉国外学者极多,为使行文简洁起见,均不以“教授”、“先生”等敬语称之。西方汉学家已取汉名者,即用汉名,而华裔学者所用西名,如“James”、“John”,便不再译出。

由于我们的能力有限,水平有限,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尚祈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无论如何,我们愿意把这套丛书奉献给学术界,以迎接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新世纪!

1995 年 12 月

序

钱中文

周发祥先生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即将问世,他嘱我为它写篇序言。由于我是看着他写成此书的,我欣然答应了。

90年代初,周君正好同傅旋琮先生共同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走向世界》这一课题。我对这一课题十分赞成,认为这可是一项大型的基本建设。当时周君设想分为5卷,后经他多次策划与组织,遂扩成了目前的这一规模:10卷本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书系。它构思宏大,史论并重。有中国文学在东西方的史的传播研究,有体裁的分类专门研究和理论的专题研究,它纵横交织,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展示了这一课题的精巧构思。

如今周君的著作面世,其它各卷也将相继出版,它们将为学界提供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的信息,包括它在国外传播的际遇和影响,世界各国汉学家对之研究的精采论点,或可备一说的论点。这使我由衷感到高兴。

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交流,使文化自身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文学也是如此。我国古典文学以其丰富的东方意韵、

独特的民族风格早就流播于世界,而被他民族所吸收,融入他民族的文学之中,成为他民族的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可是,作为一个过程,别的国家、民族是如何接受我国的古典文学的?这正是使我们极感兴趣的问题。

这里有不同的文化语境,包括接受中不同时代、社会、风尚的影响,有接受者的不同文化素质和由此而形成的不同的侧重和取舍,也有接受者使用不同理论、方法,而形成的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多姿多彩的阐述。无疑,周君的论著偏重于对后者的梳理和探索。读过他的著作之后,我以为这一梳理与探索是颇为成功的。这里集中地表现了外国人接受我国古典文学时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他们的研究与理解。我们看到,他们对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有承袭我国传统方法的。但毕竟由于民族文化语境的差异,而呈现出方法、理论的不同。近百年来,特别是西方国家,在理论、方法上时有新变,它们显示了人们对文学认识的深化,表现了理论、方法的多样。本世纪来兴起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几乎都被外国学者、华裔学人运用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例如汉字诗学、语言学研究、意象研究、新批评研究、巴洛克风格研究、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文类学、比较文学、心理学、主题学研究等等,真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这多种理论、方法指导下的阐述,大大地丰富了对我国古典文学的了解,更深、更广地发掘其中深层意蕴,从而扩大了对它的传播。我国不少理论工作者由于不大接触这方面的研究,对西方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应用于我国古典文学研究所产生的种种效果,往往缺乏感性的认识。本书收集了各种理论应用的实例,使我们获得了不少新的知识。

自然,在西方学者研究我国古典文学方面,各种理论、方法的使用,并不平衡,有的用得频繁,涉及面广,有的只有极少

数人偶而为之。从接受理论来说,接受本质上总是一种有着种种差异的阅读,即所谓“误读”,这在本国、本民族中就已如此,更不用说是它国异乡人的阅读了。西方文论中的不少理论与方法,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了微观分析的多种途径,有时真会使人惊讶,发觉文学作品还可以这样来欣赏、分析与理解的,而惊讶往往伴随惊喜,惊喜于它们确是独具只眼,而于我们则是多了一种视角、一种知识。

周君的著作在介绍这些方法的同时,表现了一种应有的辨别能力,这正是目前一些比较文学研究论述中所缺乏的品格。可以看到,不少外国文学与方法,运用于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的确使我们大开眼界,但也要看到,有的理论与方法虽很新奇,运作起来自有特色,但仔细考究,也有它们的牵强附会之处,例如汉字诗学。汉字作为一种象形、形声、会意的文字,在表情达意方面确有它的独特之处,进行深入的分析、综合研究,可能会总结出很有意义的诗学规律来。但像现在本书中所介绍的汉字诗学研究,虽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外国学者从文字上切入中国古典文学的思维特征,极想在研究中开掘出一些新意,但也确如作者所说,这一探索还缺乏一定的科学性,而缺乏科学性就会失去说服力。作者把它当作“准学术研究”,我看还是比较贴切的。善于辨析,出于对对象的深入把握,善分优劣,则出自评者学术观点的高低。当然,在我看来,学术进步是在探索中实现的。在西方学者探讨、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过程中,即使是少数人使用的理论与方法,即使是并不成功的理论与方法,作为一种分析的尝试,也是值得称道的,它往往会使人耳目一新而不失其借鉴意义,使后来者避免重蹈覆辙。

本书在资料收集方面极花工夫。中国古典文学在各种西

方理论、方法中的多种演绎和阐述,并无蓝本可依,形成现在的规模,完全靠作者一点一滴地收集资料。我深知周君在这方面用力颇勤,多年如一日,目不旁鹜,孜孜以求,十分执着,中外求索,从无间断。在资料方面,读者从本书的各种注释中可见其搜罗之广。可以这样说,本书是他多年积累的成果,同时也表现了周君缜密、细致的思维作风。如此之外,他还在本丛书其它著作中,撰写不了少专章。他的著作显示了作者理论上的成熟与丰收,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添砖加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97. 3. 7